

语言研究

浅谈越南“八月革命”诗歌形式的发展

方晨明

摘 要: 综观“八月革命”越南诗歌体裁的发展十分丰富,与之前各时期相比,该时期的诗歌是最丰富多样的。其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逐渐得以在诗歌中实现;诗歌表现形式日益完美,具有民族性和大众性;民族诗歌形式的优良传统得以发展,一些单纯为了艺术、用词过分考究、形式主义、崇洋媚外的现象渐渐被淘汰;抗战诗歌有一种真实、简单、纯朴的美;抗美援朝诗已经在现实和理想,平凡和伟大,个体和整体间良好结合并获得和谐统一;抗战时期的自由体诗得到迅速发展。

关键词: 越南“八月革命”;诗歌;体裁;特色

1940年9月日本入侵越南,越南人民掀起抗日反法斗争。1941年6月,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成立,团结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在越南北部建立革命根据地。1945年初,抗日救国运动渐趋高潮,共产党和越盟控制的解放区逐步扩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1945年8月12日越盟发出起义令。8月13日至15日,越南共产党在宣光省新潮召开全国会议,决定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与行动,及时发动起义。8月

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至17日，越南独立同盟在新潮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夺取政权、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人民和实行民主改革等的十大政策，选出以胡志明为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以武元甲为主席的起义委员会，决定在盟军开进越南之前从日军手里夺取全国政权。河静、广义两省人民首先发动起义。同年8月16日越南解放军攻克太原，揭开起义序幕。8月19日，河内人民起义，夺取政权。8月23日，中部古都顺化起义，25日南部大城市西贡起义相继胜利。从8月17日至28日，全国有60个省市先后起义，从南到北建立了新政权。8月27日，越南国民大会决定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推举胡志明为主席。8月30日，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在顺化宣布退位。“八月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9月2日，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在河内巴亭广场庆祝大会上宣读《独立宣言》，宣布推翻长达80年的殖民统治和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并宣告越南独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月革命”开辟了越南历史的新篇章。

一、越南“八月革命”诗歌的特点

“八月革命”的成功为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封建社会统治多年后，越南人民已经冲破所有的枷锁，越南民族已经获得自由。新生活为诗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引领诗歌从旧时代的崎岖小道中走了出来。诗人的崇高理想是能为革命斗争事业服务。诗歌的内容并不倾向于描写个人资本主义中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革命群众的劳动创造。

新的内容为诗歌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总的来说，从“八月革命”之后诗歌的发展趋势有如下特点：

（1）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渐渐得以在诗歌中实现。在“八

月革命”的初期，诗人们还使用旧的表现手法。

(2) 表现形式日益完美，带有民族性和大众性，民族诗歌形式的优良传统得以发展，一些单纯为了艺术、用词过分考究、形式主义、崇洋媚外的现象渐渐被淘汰。

(3) 诗歌的多种风格得以发展。创作个性可以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粗犷、不严谨的现象也渐渐得以克服，表现形式的创作性质日益明显。

(4) 诗歌类型的扩展。一些传统形式恢复使用，多种新形式又不断涌现。形式服务内容的规律能被充分运用，使形式更符合内容。

上述诗歌形式的特点在不同的革命时期以及不同的作者身上表现出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在革命初期诗歌仍带有规约性和象征性，但是此时的诗句带有革命斗争胜利的高昂斗志，还带有人们刚从黑暗冲向光明的陌生感。这个时期的诗歌虽然不吝惜情感歌颂了革命理想和自由生活，但缺乏对新生活 and 人的具体描写。在歌颂新制度时，诗人还带有主观感受，使用规约形象和象征手法。像其他诗人一样，春妙在《国旗》和《山河颂》中也是运用了旧的表现手法来表达新思想和新情感，正因如此，使得形象诗变得笼统，难以勾起情感的共鸣。

Cờ bay sáng! Cờ bay hồng! Rạng rỡ!

Hỡi dân Việt! Cờ của ta vẫy đó

Tiến lên! Tiến lên! Theo sứ mạng non sông!

Cờ là ta, là dân chúng, cờ mọc tựa vùng đông

Sống hay chết chẳng nhục dòng giống Việt

Dân là nước, nước là ta đã quyết!

Kìa sao vàng máu đỏ đã cao treo!

飘扬的黛青旗！飘扬的红旗！艳丽夺目！

越南民众！我们旗帜在召唤！

前进！前进！祖国的使命！

旗帜即我们，即民众！旗帜升起靠红日！

生与死不辱越人宗族，

民众即国家，国家即坚定的我们！

那金星红旗高高飘扬！

一些诗人如制兰园、辉瑾、阮春堂等都倾向于进行诗歌创作以服务革命。但由于深受宗教形而上学的影响，所以还有很多陈旧思想和表现。处在世纪中期，辉瑾感受到了新生活正在崛起，而旧制度也即将分崩离析。辉瑾的诗句也多少运用了象征描写的手法，并且在革命前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

Nằm giữa lòng thế kỷ

Nghe bay thoát lên từ lòng thế kỷ

Dòng tâm tư áp úng buổi tiền thân

Nghe xương sống ca bài ca hùng vĩ

Của ngàn muôn thế hệ ngẩng lên dần

躺在世纪的中心

感觉从世纪的中心摆脱

神志哽咽前身

听脊椎赞颂雄伟之歌

千万代人渐渐昂首挺胸

就如同阮春堂的喜悦之情，淡淡的喜悦分散在模糊的认识上，诗的形象得以根据主观联想而结合。

Ta khát vô biên ngọn sóng vang
Ta mừng hội gió lúc lên đàng
Ta hát vô biên trên sách mới
Và trên thế giới đượm trăng gang
咱渴望无垠的浪尖咆哮
咱喜欢风上路之际
咱在新书里纵情歌唱
且世界上还有长江

该时期的诗歌语言还表现出热闹喧嚣，有时甚至空洞浮泛的特点。政治和生活的新词汇也得以运用到诗歌中，但少了几分圆润。各类型的诗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通过实例，我们清楚认识到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并不相符。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形式的改变通常比内容慢，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对于新生活的理解不够深刻，一些陈旧的艺术观点还在支配着他们的想法和表现。

上述的限制在以 1930—1945 年革命斗争为题材的诗人身上比较不明显，代表诗人是素友。有些作者的诗作既不属于上一辈的体系，也没有明显表现出上述弱点。事实上，那正造就了简易、清新的诗歌与受古代诗歌影响、用字考究的诗歌交错并共存的现象。

二、抗战初期的越南诗歌简约真实

从全国抗战开始，是一个到处常年战乱、生活艰辛的年代，诗人们已经对形式和内容都进行了改革。战争奇妙的发展步伐，以及群众在生产 and 战斗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对文学提出不少重要的问题。群众是革命的核心，力量雄厚，那么文学艺术是否

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一种活动呢？写给谁，怎么写是创作中最直接、具体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文学艺术的争论也涌现出来，艺术家们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还要继续“认路”，在抗战初期文学艺术氛围十分浓厚。思想和内容的重要变化决定了文学形式的发展，特别是诗歌的形式。诗歌，原本是被看作容易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类型，已经成为革命群众亲近的好友。正是在该时期内，诗歌形式的发展特别迅猛。群众不仅仅是读者，更是参与诗歌创作的人。诗歌队伍里的所有人，包括专业和非专业的诗人，都对诗的发展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诗歌自由发展，诗没有押韵，军队里的诗、企业板报上的诗，合唱、快板、独奏等形式已经十分普遍。诗歌是生产和战斗的动力来源。虽然诗歌的形式变化多样，但总的来看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1）诗歌日益彰显出简单真实的美，一些单纯为了艺术、用词过分考究、形式主义、崇洋媚外的现象也渐渐淡出；

（2）各种形式的民族诗歌的优良传统得到开发和发展，非常符合创作需要体现的爱国情怀。

追求诗歌简单真实的过程，也是与形式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也正是民族艰苦而光荣的斗争决定了这个转变，正如济亨对该时期自己作品的思考一样：

从一开始到1948、1949年，我写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抽象并且远离人民群众战争实际的，比如为了纪念入党日：

Sang bờ tư tưởng, ta lìa ta

Một tiếng gà lên, tiễn nguyệt tà

到达思想的彼岸，我们彼此分离

一阵鸡鸣，弯弯的月为我饯行

抗战诗歌为越南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作品，内容真实丰富，

形式简单清新。诗歌的形象和语言十分熟悉，贴近生活，就如同我们每天在生活遇到的一般。战线上的战士、工人、参加抗战的母亲、女游击队员、儿童联络员，这些形象都被记录到抗战诗歌中。军民之情、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同胞团结一致，相亲相爱，如同蚕丝般。抗战诗歌同时也肯定了表现艺术的新审美标准。在抗战初期，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仍在一些诗歌中出现。个人英雄主义、小资产色彩经常在诗歌中以一种考究的形式和浮华空洞的词语来表达，比如“迷运会”、“妖娆芬芳”、“英雄债”、“万里鞋”、“长征尘”、“琉璃后跟”、“镇御”、“冤仇”、“巍峨”、“辉煌”、“容颜”等。抗战诗歌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对民族传统诗歌进行开发和发展的。抗战歌谣发展较为成熟，演歌得以运用精湛的艺术水平。诗人们巧妙地将现代性与民族观念结合在一起，将《金云翘传》、《征妇吟》和民歌歌谣的气息运用到自己的诗歌中。诗的形象十分熟悉、亲近，诗的语言充满了传统的韵调。素友的《越北》诗集就结合了以上优点。英雄爱国主义通过一些典型的感受和美好的人物形象得以具体表现出来，特别是妇女，从《开路》中的妇女，《老妇人》、《母亲》中的母亲形象，到《越北》中的姑娘。

我们从诗歌中看到了妇女在家事国事中能干的一面，辛勤劳作，富有同情心，有越南妇女传统的品行和观念。

诗集《越北》的成功并非偶然，与素友革命前的创作是密不可分。从诗人进入革命生活后，素友的诗魂已经和时代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素友并不受限于前一辈诗人所创造出来的成熟规律，他跨出了代表“八月革命”诗人新一代勇敢但并未稳固的第一步。除了素友的诗作外，这一时期很多作品都反映了民族性格，如阮亭施的《祖国》，济亨的《宁顺的妇女》，新色的《登禁山》，陈友椿的《拜访水稻》，姜有用的《行军》，英诗的《武陵记

事》，黄忠聪的《开地歌》，黄禄的《探友》，洪原的《思念》，明惠的《今夜胡志明不入睡》。秀肥的《抗战中的笑脸》在打破内容和嘲讽类诗歌的形式上发挥了民族本色。抗战诗歌有一种真实、简单、纯朴的美，但还不够丰富。诗歌的潮流有宽度但还没有深度，取得了很多人瞩目的成绩，但并不均衡。诗中的形象很多时候还略显简单粗略。上一代诗人在新的实践中也逐渐成长起来。春蚕食桑已经开始吐丝结茧，但还没到收获丝的季节。新生活经验、新感触、新思想的累积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根据情感与理智的和谐规律、思想从量变到质变规律而发生变化。济亨写得一手好诗，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我的摸索可以说持续了整个抗战战争时期。”

如果和今后的诗路比起来，辉谨的作品并不多，他解释道：“我那时的内心世界并没有萌生什么新的情感要素，在诗歌创作中思想必须与情感一道变为唯一的心理状态，在催促之下才会有新的作品。”

制兰园的《致同志们》描写了真实生活的本质和战火纷飞的不安，但还缺乏创造力的深度。春妙同样受到旧的表现手法规律的支配，虽说他的作品较多一些。

从一个脱离现实的艺术观念到与生产、战斗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从把艺术当作一个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享受的奇妙的精神产品到把艺术作为革命群众的精神食粮——这个转变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有时会从这一极发展到那一极。创作诗歌中的简单粗犷现象也曾经在上一代诗人中出现过，这些诗人曾经被当作是“老练艺术”的诗人。

三、抗战时期的诗歌“与新的实践一起成长”

回到诗人和“八月革命”一起成长的话题，我们发现有不

样的表现。他们没有走“和新的实践一起成熟”的道路，而是走了“和新的实践一起成长”的道路。两条不同的诗路引向了同一条道路。在抗战时代，阮庭诗创作了大量关于战士和民族斗争的诗作。诗集《战士》在形式上就较为新颖，新颖在于还带有体验的意味。阮庭诗在格律原则上并没有被定律或者习惯所束缚，但仍知道在形式上保持正确的规律。《战士》中的很多诗篇都是自由体诗。诗的节奏灵活而顺畅，形象得以甄选，思绪沉淀而没有蔓延。在形式上，阮庭诗的诗已经从自由体诗发展到无韵诗，这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韵仍是一把利器、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但应避免受到韵调的束缚。阮庭诗可以根据无韵诗来创作最终写出好诗。

一些别的诗人如黄中通、光勇、政友、武高、陈友椿、姜有用、明惠等，也有不小的贡献。特别的一点是，一些诗人已经在创作生涯中达到了巅峰。我们想起了黄中通的《何时归来》和《开荒之歌》，光勇的《西进》，黄琴的《天德江的另一头》，明惠的《今夜胡志明不入眠》，陈友椿的《拜访水稻》，姜有用的《行军》，农国振的《回乡》等。有时提起抗战时期的诗歌，我们会从作者想到了社会运动。上一代的诗人正身处改革的环境中，并为自己创建新的风格。和“八月革命”一起成长的诗人处在了形成风格的大环境下。

广泛地说，所有的抗战诗歌都是一种大的风格，每位诗人都为此做了贡献。这种创作风格，在人民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通过典型的笔法而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对于革命后创作过程的思考，辉瑾想到了1958年，在这一年，作者的《诗魂》仿佛是最后一滴水将瓶子注满：“深入矿区不仅激发了我之前的情感，还开花结果——《天越来越亮》诗集，在那之后又推出两本诗集《开花的土地》和《生活的诗篇》。”

在1958—1965年间，春妙也连续出版了多本诗集，《个性与共性》（1960），《握手，金瓯角》（1962），《一片红》（1964）。别的诗集也在陆续出版中。济亨的《南方之心》、《致北方》、《浪声》、《相亲的两半》，制兰园的《阳光与泥沙》，阮庭诗的《黑海之歌》，黄中通的《我们的旅程》、《船帆》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诗人在该时期内出版了诗集，如阮春堂、范虎、元鸿、彭士原、征唐、明惠、姜有用、远方、春黄、桃春贵、永梅等。

成批作品的诞生标志着诗歌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也是现代诗歌从未出现过的盛况。这并不是偶然的成功，而是由于在10年革命中对于情感、思想、生活经验和表现技术的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变化的过程。

这个文学现象证明了上一辈的诗人已经在新的实践中成熟起来，在创作过程中有很高的质量；同时也证明了和革命抗战一起成长起来的诗人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美好的成长结果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出现了各种诗的风格，事实上很多风格已经形成并改变和发展。

在写了《越北》后，素友写了《狂风》，从《从那时起》到《越北》再到《狂风》，素友诗的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素友诗中主要的情感是和民族生活中的一些代表事情密不可分的。理想强大的吸引力总是在时代和战争的最前沿，真挚深厚的情感，珍视并歌颂人生的美好给素友带来的特别品质。素友的诗在普及和提高之间，民族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简约和丰富的创作能力之间，情感和言语之间深刻结合。从《从那时起》到《狂风》，素友的诗作风格得以日益开阔，境界也有所提高，歌颂生活中源源不断的美和力量。而他的诗作中思想性和概括力也与生产、战斗生活的人们的形象和心境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从《致同志们》到《阳光与泥沙》，制兰园已经迈出了很大

的一步。《阳光与泥沙》更倾向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找到并肯定了联想和斗争中新的、现代的东西，并弃用旧的、过去的东西。他的诗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时而深切浓厚，时而惆怅孤单。他的诗富含情感和思考，诗的形象富有创造性，运用很多新颖的联想和对比。在写了《阳光与泥沙》之后，他的诗句承载的思想越来越沉重，语言也越来越自然流畅。

在革命前，辉瑾对于惆怅和孤单的情感十分敏感，而今他的诗言语仁厚，深切联系着新生活。他的诗又有了新的起色，成熟却富有活力，在智慧和情感、在真实人生和浪漫理想间巧妙结合。辉瑾的诗少了几分热切和浓烈，他的诗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和发展。

在革命后，春妙写了很多诗，并不断摸索创造。他的诗充满了对革命和生活的热情。他的诗句似乎在变化，在突破，在变开阔，在变形式和内容上愈加深入。他的诗有不变的东西，也有变化的东西，有出彩的地方，也有略显粗糙的地方，在形式和内容上还少了几分抑扬顿挫。

济亨的诗言语热情，情感温暖。他在统一斗争的题材上大获成功。他诗里的情感并不单调，在新理想的光芒下萌生了更多的情感。他的诗的情感并没有限制他反映现实的能力。

阮庭诗的诗十分有号召力，理智的气息偏沉重。对于代表性情感和形象的甄选，理智的认知能力给阮庭诗的诗带来不一般的魅力。他的诗集中于形象和感触，言语和结构相对严密（如《祖国》、《黑海之歌》），然而他的诗缺乏一种出于本能的沉醉，在充满生活的孕育下，诗难免受束缚。

黄中通从《我们的旅程》到《船帆》，已经“自我”肯定了一种艺术创造风格，他的诗紧凑而有力量，带有浓厚的生活色彩。黄中通的起点就是现在，他很少谈到过去，他的诗也很少提将

来。他的诗缺乏让人为之沉醉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总结很多诗人的创作风格，如英诗、农国振、斑才瞳、刘重庐、姜有用、玄骄、陈友椿、征唐、元鸿、范虎、明惠等等。上述诗人都有可贵的品质，英诗情感细腻开放，农国振纯朴浓厚，斑才瞳朴素真诚，刘重庐强烈热忱，陈友椿质朴而清新，征唐辗转反侧、探寻，元鸿苦苦冥思，范虎彷徨、创作，明惠简单成熟。

“八月革命”后诗歌风格的形成，对于越南诗歌来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前进了一大步。获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因为诗人在思想、情感、生活经验和表现技术上长期积累和经过严谨的锻炼。

四、抗美救国时期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诗歌

第二次民族抗战（1961年）在奠边府大战胜利十年后爆发。越南人民带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坚强不屈的优良传统和勇敢的精神再次步入无比光荣的历史任务中。越南人民是突击队，是进攻先锋，是历史支点，越南已经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粉碎时代最凶暴的敌人的阴谋。美好的事件、勇敢的榜样、可爱的人们，每天都出现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革命英雄主义也达到了最高峰，带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有着强大的动员力量。光荣传统中一些美好的事物在更高的新阶段得以延续，而这是以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的。抗美救国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抗战初期，艺术家们就意识到了在历史最神圣的时刻自己对于民族对于时代的责任。抗美的枪炮声响起，充满歌颂和仇恨的诗歌也同步响起：

Yêu với căm hai đợt sóng ào ào

Vỗ bên lòng và dội mãi tới trăng sao

爱与恨交织，如两重喧腾的浪潮，

击拍着我们的胸膛，在夜空中回响。

（春妙）

诗歌发挥了及时的战斗性和灵敏的实事性。在仇恨的战火上，在每一颗爱国心中，诗歌无处不在。描写生活许多不同的方面，从对抗敌军军机的战斗到建设一座桥梁，从阵地上的司机到田野上的女游击队员，从战斗中的欣喜之情到分别时的留恋不舍。抗美援朝在初期便肯定了诗歌新发展阶段取得的成就。

抗美援朝诗深刻表达了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股新力量深入到诗歌中。那是对旧时传统、对当下胜利、对未来信心的自豪。抗美援朝诗是抗战之歌，诗性和刚性相互交融，对革命乐观的态度超越了损失的伤痛。思想上没有任何限制，比如抗法战争初期的诗歌，或者和平年代祖国统一斗争诗歌。抗美援朝带着远大的理想，充满了战斗性，真实却不粗略，提及生死别离却不是一味沉浸在悲痛中，肯定信心和梦想却不是一味幻想。

革命英雄主义是主要的内容和情感，得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和表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和欣赏方式，但可以明确的是所有都为了一个唯一的目标。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得以提高。阶级基础创造了情感的深度和有关民族观点内容的灵活性。

诗人内心忧虑的是如何才能在最光荣的历史时刻表现出越南人民的性格和精神，如何诠释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民族的斗争和时代发展之间的既具体又无形的羁绊。除了一些描写真人真事的诗歌如阮文崛、阮写春、陈氏里、阿穿的母亲等等，越南有描写战争前线上人物的诗歌，描写了高射炮战士、工兵战士、女游击队员，也有诗人想要对祖国和英雄人物的印象在创作中进行概括。

抗美救国诗明显体现了理想和现实，平凡和伟大，总体和个体，现实和浪漫等的结合。以上范畴在诗歌中，在对立和谐的关系中比比皆是，但并非总是这么和谐。在革命前，诗歌中仿佛有很多永远的对立面，革命带来了很多现实的基础和辩证的观点，使诗人在这些范畴中看出统一性。这是对于原理和可能性来说，实际上诗歌的发展也会在某一时段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抗美救国诗已经在现实和理想，平凡和伟大，个体和整体间良好结合并获得和谐统一。

每天理想都在变成现实，而每天现实也会为理想插上翅膀使其飞得更远更高。战斗十分伟大而具体的一点是它深入诗歌中，并成为诗歌稳固的基石，又同时保持诗意的纯洁。从这样的现实展翅飞向美好的理想和梦想。很多上一辈的诗人也如同新生的诗人一样，注意培养自己诗歌中生活的实际性和理想的诗性。春妙很注重将生活实际写入诗中。黄忠聪则是从现实的基础将诗意体现得更淋漓尽致。素友、辉瑾从共性中表露出明显深刻的个性。春妙、制兰园则是一开始从个性中找寻到普遍的共性。

抗美救国诗继承了南方革命诗歌的积极传统并不断发展。江南、青海、秋盆、黎英春的抗美救国诗体现了热切深沉的情感和英雄主义。如果没有注意到题材和作者的创作风格，那么将很难区别南方革命诗歌和北方的抗美救国诗歌。另一方面是，祖国统一斗争的诗和打击美军、伪政府的诗一样，也是直面打向敌人。以上条件都为诗歌进入抗美救国时期取得出色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上阵》、《血与花》等诗集中，素友仍然坚持和发展传统诗歌的风格，在构思上也维持了对立面的和谐，思考和政论要素得到了加强。制兰园的抨击敌人的诗如《百日花》、《报风鸟》肯定了诗歌风格的新发展。从伤悲的盆地到喜悦的田野，制兰园在

诗中深刻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智慧和思考得以培养和提高，作为形象诗的中心。除了七言四绝诗清新充满感情色彩之外，制兰园的形象诗很多时候陷入了理智的泥潭中。辉瑾的《60年代》、《近战场》努力将战场生活的气息带到诗中。在思考和政论得到加强时，诗的形式也会有变化。诗集《两个手掌》对少儿诗歌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春妙的《两行波涛》、《我的双眼》，能维持着在日益丰富的题材上的情感充盈的舒畅气息。从《一片红》到《两行波涛》，春妙努力通过创作实践来肯定自己提倡的观念，但在春妙的作品中很多时候会将实际生活和粗略的材料混淆。济亨的《新的赞歌》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新标志。济亨的实践有一些获得了成功，也有一些不幸夭折。

政友凭借着《枪与月亮》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创作风格。政友的诗既深刻刻画了人物形象，同时又隐藏内心的想法。语言的含蓄性、调律的短促坚定，形成了与内容相符的形式。《枪与月亮》集合了政友十五年的诗，其中在全国人民情绪亢奋下写出的抗美的诗歌在气势上略胜其他诗歌一筹。从《船帆》到《波澜》，黄忠聪努力创作力求更进一步。他的诗与战斗、生产的实际紧密相连，但同时想象力也使诗的档次提高。农国振对于实事有很强的敏感性。他的诗既朴实无华又展开想象进行概括，农国振保持了有个人特色、清新的诗意。全民的抗美救国事业给诗人带来了很多感触，如同正在燃烧的火把照亮诗人的内心。刘重庐的《笋江的姑娘》，英诗的《白色的菠萝花》，阮春瞳的《滨海故乡日记》，在每个人的创作历程上都画下了浓重的一笔。刘重庐的诗包含深情和诗意，但在内容和形式上略显陈旧。英诗的《白色的菠萝花》仍有七言四绝的踪迹，但明确的是同《玉岛》相比更贴近生活，并且情感更加真实和强烈。春黄、征唐、彭士原、明惠、阮写览、玄骄、范虎、梁安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